

青少年体质健康与素质教育

——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

马秀梅

(上海城市管理学院 体育教研室, 上海 200432)

摘要: 针对近10年来全国青少年体质健康连年下降的现象, 运用博弈论从国家、学生及其家庭、学校和教师以及地方政府等各方在“升学率”这个基点上作出利益分歧和利益博弈的分析, 并建议: 创立中国特色的教育理念和哲学; 对现有教育利益关系调整和再分配; 加强教育法律阐释、制定细则; 最主要是现阶段增加并提高体质健康在考试总分中的权重和比例。

关键词: 体质健康; 利益相关者; 博弈

中图分类号: G40-0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 - 0627 (2009) 04 - 0091 - 04

2008年9月, 教育部等联合下发第二届《开展全国亿万学生阳光体育冬季长跑活动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通知刚出台, 就引来一片争议。这表明国家与学生、家长及社会在基于体质健康的素质教育上分歧明显。事实上, 我国学生体质连续下降的形势十分严峻。从1998年到2007年间, 国家体育总局的两次体质监测显示: 10年来全国青少年视力不良检出率居高不下; 耐力、爆发力和肺活量等体能素质指标连年下降; 超重及肥胖的检出率快速上升。与此同时, 国家体育总局的问卷调查显示: 65%的学生每天锻炼时间不足1小时, 近1/4的学生几乎不参加体育锻炼。^[1]

尽管学生体质关系到学生最切身的利益, 但正如教育部体卫艺司前体育处长季克异接受新华社专访时表示: “教育部力图推进素质教育, 但是阻力很大, 因为客观上家长是抵制素质教育的。”^[2]

对于造成学生体质健康持续下降的原因,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下称《意见》)中指出: “一方面由于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影响, 社会和学校存在重智育、轻体育的倾向, 学生课业负担过重, 休息和锻炼时间严重不足; 另一方面由于体育设施和条件不足, 学生体育课和体育活动难以保证。”针对学生体质下降的难题, 本文拟从围绕基于青少年体质健康的有关各方, 在“升学率”这个基点上进行利益分歧和利益博弈的分析, 寻找纾解思路, 从而协调利益、追求共赢。

一、利益相关者的博弈分析

(一) 国家

国家的教育目标是要培养各种层次和类型的人才和数以亿计的普通劳动者。国家实施阳光体育教育, 是要最大程度地实现教育的公共利益, 实现全体学生全面发展和民族体质与素质的整体提高。中国教育的基本矛盾是对于优质教育的强烈需求和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严重不足的矛盾。囿于国家财政和地域差异, 中央政府采取的是一种非均衡化教育政策, 旨在实现重点突破和优先发展。为此, 国家采用了精英取向和大众取向两种教育: 如“211工程”、“重点校”、“示范校”等政策, 以财政、人才倾斜政策集中优质教育资源, 以中考、高考等考试制度集中优秀生源, 为国家选拔和培养精英人才。与此同时, 国家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发展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 用以培养数以亿计普通劳动

收稿日期: 2009 - 03 - 04

作者简介: 马秀梅(1975-), 女, 上海市人, 上海城市管理学院讲师。

者和一批高技能人才。

以分数筛选界定学生优劣的考试制度,以地域配额和学校分类录取为主的招生制度,以为高一级精英学校输送优秀学生为目标的的教学制度,以梯次文凭作为选拔人才、招工录用标准的人事制度,这四个现行制度以强力配合国家的教育目标,使其政策最大程度地得以推行和实施。

国家教育目标和配套政策对不同学生主体所作的教育利益——主要是权利、机会、资源——的分配与安排,通常会成为学生实现社会流动和分层,获得一定成就、财富和地位的主要因素。因而国家非均衡化教育政策和四个配套政策对学生、家庭和社会的利益影响是极其深远的。^[3]

(二) 学生和家長及其家庭

学生及其家庭对教育的诉求通常是以个体和微观利益为主导的。家长和學生期望通过升学获得更高的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取得就业和发展的竞争优势,得到较高的收入、财富和地位,实现社会流动和进入主流社会。虽然国家教育总体要求是培养普通劳动者,但对于受教育者来说,则更强烈期望成为“数千战略尖端人才、上千万高级专门人才”中的一员,而不希望变成“金字塔”的底端——“数以亿计的普通劳动者”。

作为一个群体博弈,不能认为学生和家長不想拥有更好的体质和更高的素质,但任何教育都以利益为根基,对个体而言教育成败在于利益追求及其过程中的成本——收益计算。尤其是现行一胎化政策环境下,没有数量选择,唯有质量至上。虽然义务教育国家免费,但之后必须通过应试筛选才能获得优质的非义务教育机会。高中和大学所具有的竞争性和排他性,沉重的家庭教育成本负担,是学生和家長面临的严峻现实。由于当前中国个人收入与受教育程度存在着高度的相关性,当社会以“学历”和“名牌”,而非“素质”或“体质”作为衡量标准时,出于博弈考虑,大多数家庭和學生只能把绝大部分精力和财力花在应试学习上:或采取各种补偿措施,使自己子女所受教育比其他孩子有更强的竞争性;或集中力量只攻语数外,摒弃应试之外包括体育在内的其他教育,以此提高进入精英教育的概率。

学生、家長及其家庭群体外的博弈首先是和国家的博弈,主要是对国家规定的课程标准和教育内容进行轻重主要的排列和取舍;与学校的博弈则集中在学生的分数和名次、升学率的高低上,这也同时成了对教师评价、选择甚至要求“下课”的唯一标准。在大多数情况下,学校为了声誉和效益,会顺从学生和家長的意愿,淡化或放弃国家的公共利益。学生、家長及其家庭群体内的博弈是“囚徒困境”下的博弈,即他们处在不可逆转的困境中,无法通过自己的力量去左右局势,只能做出损失尽可能小、最利于自己的选择。首先,困境给每个学生都提供了两种策略:策略1是投机取巧“考什么学什么”;策略2是老老实实“提高综合素质”,假设学生甲和学生乙的起点基本情况相同,都想在高考中取胜,当他们都采取策略1时,两人平分升学机会,获益可分别记为5;当他们都采取策略2时,两人也是平分升学机会,获益也可分别记为5;当学生甲采取策略1,学生乙采取策略2时,学生甲的获益实际上比学生乙要大,获益可分别记为7和3;相反,学生甲采取策略2,而学生乙采取策略1时,获益应分别记为3和7。这里存在两个纳什均衡,双方只能采取“淘汰最差者原则”,这个期望由划线法决定,即双方都认为“考什么学什么”是最利于自己的策略。从群体博弈角度看,率先“考什么学什么”肯定能挤占他人的升学机会;老老实实“提高综合素质”的获益总是趋近3,“考什么学什么”获益则趋近7;而当整个群体都醒悟时,则谁都不能在5以上额外获益,但也不会低于5而额外受损。

其次,困境给学生家庭也都提供两种策略:策略1是全力以赴“助推孩子应考”;策略2是顺其自然“任由孩子成长”,假设学生甲家庭和学生乙家庭的基本情况相同,当他们都采取策略1时,两个家庭平分升学机会,获益可分别记为5;当他们都采取策略2时,两个家庭也是平分升学机会,获益也可分别记为5;当学生甲家庭采取策略1,学生乙家庭采取策略2时,学生甲家庭的获益比学生乙家庭要大,获益可分别记为6和4;相反,学生甲家庭采取策略2,而学生乙家庭采取策略

1时, 获益应分别记为4和6。由划线法可断定双方一定会认为最稳妥的策略是“助推孩子应考”, 拼搏应试。

(三) 学校和教师

学校和教师一方面要贯彻和实现国家的教育目标, 另一方面又面临市场竞争和实现自身利益的现实。学生及家庭通常对学校及教师的选择是能否为其带来利益最大化。这种博弈往往压迫学校和教师作出变通和妥协, 造成“应试教育扎扎实实”^[4]。

促使学校迅速弃“素质”而奔“应试”的更重要原因是学校之间的博弈。假设有甲、乙两所水平相当的学校, 在当前的招生考试制度困境下, 他们都有两种可供选择的策略, 策略1是“转搞应试教育”, 策略2是“坚持素质教育”, 共有20个升学机会可供他们争夺, 当他们都采取“坚持素质教育”策略2时, 两校学生平分升学机会; 而率先采取应试教育措施的学校, 有机会让本校的学生挤占更多的升学机会: 当甲校先搞应试教育, 乙校仍搞素质教育时, 甲校学生获取15席而挤占了乙校学生5席的升学机会, 可用(15, 5)表示; 相反, 当甲校坚持素质教育, 而乙校转搞应试教育时, 甲校学生的5席升学机会被乙校学生所挤占, 用(5, 15)表示。尽管从群体角度看, 都采取策略1结果只是平分升学机会, 但如果某所学校重新“坚持素质教育”, 则其学生的升学机会立即从平均水平的10下降到5附近。所有的学校都不能从“应试教育”中退缩, 这是一个难以摆脱的博弈困境。

(四) 地方政府

在这场围绕教育利益的群体博弈中处境最为微妙的是地方政府。历史和地域的原因决定了优质教育资源大多聚集在东部沿海地区或经济发达地区, 并且又主要集中在京、津、沪等特大型城市。占有优质教育资源的地方政府尽可能地举行本地化自主高考, 实行地域化招生倾斜, 在招生资格准入、录取分数门槛上设置歧视性条款。教育资源缺乏地区的政府则一方面以“教育公平”为名, 挤占优质教育资源; 更重要或更主要的另一方面是从政策层面对教学、课程、师资、生源、财政等多方位调控, 确保培养出一批高考尖子, 用以抢占国家级优质教育资源, 这是博弈的重点。博弈的关键是扬长避短、集中优势兵力, 突击应试科目。地方政府群体博弈的必然结果是: 高考分数和应试教育成了硬道理, 体质健康和素质教育变为“鸡肋”。^[5]

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可以诠释地方政府间这场博弈的胜负结果: 以素质教育闻名全国的南京市, 高考平均分等远逊苏北小县城, 10年最好排名是江苏省第9名。教育局在家长的问责声中只能步步倒退。人民网热评是对高考指挥棒的屈服。然而南京能为素质教育的大旗不倒而继续耽误学生的一生、家长的后半生吗? 然而回头走应试教育之路, 国家不同意, 社会也指责。何去何从, 真是难以抉择。

二、对博弈各方的建议

北京大学校长许宏智说: “实行当前的高考制度, 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就目前来说, 没有更好的高校招生选拔的办法。”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也说: “就目前我国的社会环境、人们的思维方式而言, 我认为全国统一考试是好的。”^[6]这就是为什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的问题中, “高中取消文理分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和“如何改革考试招生制度”用词完全不同的深意。在现行考试招生制度变动不大预期下, 淡化“升学率”、强化体质健康可采取以下对策:

首先是正面回应和充分考虑学生及家庭在教育上的利益诉求。有限提供学生及家庭教育选择权和参与权, 与国家利益取得一种协调, 让学生从“受教育者”成为实现自身教育利益的利益主体。

其次是对现有教育利益关系进行调整和再分配。建立优质学校经费收入与薄弱学校分享等再分配机制, 淡化直至取消学校等级制, 促进各级各类学校均衡化, 则学生在共享平等教育机会同时, 会弱化择课、择校的应试动力。

再次是借鉴国外成功的教育理念和实践, 创立中国特色的教育理念和哲学。唯此才能更新陈旧的教育观念和价值观, 才能改造根深蒂固的考试文化, 才能使国家教育目标真正和国民的个人目标

紧密相附,才能使學生完全脱离应试教育。

与此同时要加强教育法律阐释、制定细则、加大监督和处分的力度。值得注意的是,最近有关体质健康的中央文件极其具体,如《意见》《通知》等。此外,《全民健身条例》首次规定:今后“未开展课外体育活动”和“未保障学生每天锻炼一小时”的校长,将被追究法律责任。这必然会保证国家目标的完成。

当前重要和紧迫的当属高考增设体育科目、中考提高体育在考试总分中的权重,唯此才能逼迫地方政府和相当大一部分学生及家庭改变博弈策略,增加对体育等素质教育的投入;也可以大大加强国家、学校和教师就体质健康教育进行博弈的筹码份量。行动改变观念。假以时日,只攻语数外的“片面”的幅度和强度就会逐步减退。《意见》中已要求“全面组织实施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并逐步加大体育成绩在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和中考成绩中的分量。”一些地方政府也已率先行动:

北京市 2009 年起只有国家体质健康标准达到优秀的学生才有资格被评为“三好学生”,并将出台“阳光体育徽章”评价制度。^[7] 辽宁省从 2009 年起,把初中体育考试分为平时考核和集中测试两部分,总计 60 分纳入中考成绩。四川省规定中高考学生如果参赛并达到二级、一级运动员和国家健将者,可享有中高考加分 20 分、40 分和 60 分的鼓励。据该省教育厅统计,以 2008 年为例,高考每增加 20 分便可超越 20 000 名以上的竞争者。^[8]

这些政策立即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并出现良性互动。可以预期,在政策引导和规制下,学生、家长和社会将会弱化择课、择校的应试动力,强化包括阳光体育在内的素质教育,逐步趋向全面发展,达成基于学生体质健康利益各方的和谐和共赢。

参考文献

- [1] 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 2007 年国民体质监测报告[M]. 北京: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 2008: 9~28.
- [2] 刘阳.中国学生体质调查之二:学生体质下降孰之过[EB/OL]. (2006-04-20) [2009-04-20].<http://www.XINHUANET.com/zt/shzyxnc/zyjs.htm>.
- [3] 刘复兴. 教育政策的价值分析[M]. 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3: 39.
- [4] 李家成. 学校教育是一个利益场:“利益”视角下的学校教育[J]. 安徽教育学院学报, 2003 (2): 3~6.
- [5] 周俊平. “健康第一”与学校体育[J]. 体育学刊, 2002 (2): 27~30.
- [6] 教育部中外大学校长论坛领导小组. 中外大学校长论坛文集:第二辑 [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4: 45~61.
- [7] 尹维和. 体质优秀才有资格评“三好” [N]. 北京日报, 2009-01-15 (05).
- [8] 晓舟.四川中小学寒冬游泳赛受捧[ED/OL]. (2004-01-08) [2009-01-08].<http://http://www.china.com.cn/GB/jiaoyu/1055/2430181>.

Upon Adolescents' Physical Wellbeing and Quality Education

MA Xiu-mei

(Dept. of P.E. Education, Shanghai Urban Management College, Shanghai 200432, China)

Abstract: The author is trying to analyze gaps and game-playing of state and local governments, students, families, schools and teachers in terms of interest in higher grade enrolment rate so as to handle the continual degradation of teenagers' physical health. To solve the problem, the author suggests that such steps are taken as conceiving unique Chinese educational insights and philosophy, adjusting educational interest relations and distribution, enhancing law interpretation and formulation, and in particular, currently increasing the weights and proportions of physical wellbeing tests in total scores.

Key words: physical health; difference; game-playing

(责任编辑 裴云)